

顺
德
文
丛
第
三
辑

南国丝都

——
顺德蚕桑丝绢业
发展史研究

吴建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顺德文丛（第三辑）

南国丝都

——顺德蚕桑丝绸业的历史与文化

吴建新 著

 人民出版社

《顺德文丛》顾问

欧广源 郑国雄 黎子流 陈用志 冯润胜 陈云贤
刘 海 梁毅民 周天明 梁维东 黄喜忠

《顺德文丛》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芙 丘国新 叶春生 司徒尚纪 刘斯奋 肖承罡
岑 桑 邱 捷 陈忠烈 洪三泰 骆 伟 黄天骥
徐南铁 谢望新 谭元亨

《顺德文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梁惠英

主 编：招汝基

副 主 编：饶林海 赵里平 沈 涌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马曼宁 李健明 何劲和

沈 涌 麦润沾 张新杰 吴锡标 招汝基 赵里平

饶林海 梁惠英

《顺德文丛》第三辑序

林 雄

文化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既能帮助我们回顾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顺德自古人文蔚盛，名人辈出，地方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敏于思、善于行的顺德人不断将丰富鲜活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总结提升，大大丰富了顺德文化内涵，进一步彰显了地方文化的特色和个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发挥文化在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培育城市精神，需要文化的润泽。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是文化之核心。历史证明，只有文化才能将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精髓吸纳存留，汇成城市的精神长河，滋润着城市文明的萋萋芳草和茂盛树林，推动城市持续健康前行。顺德精神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和沉淀，不仅成为顺德人的精神归宿，也成为顺德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基石。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城市功能面临着深刻的调整，顺德更是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顺德亟需通过文化的提升与创新，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城市文化精神并以之凝聚各方共识、积聚各种力量，不断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顺德城市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实现新一轮的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顺德，需要文化的支撑。省委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十二五”时期的核心任务。建设和谐幸福社会，既需要加快发展，创造幸福生活的坚实物质基础，更需要倡导科学理性的幸福文化，构筑幸福精神家园，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要求更高，期待更高，对精神文化需求充满了新的渴望。这就需要进一步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上来深化对文化

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文化自觉，让蕴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理想情操、审美情趣通过注入时代元素，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文化给养和城市的新鲜血液。这就需要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向全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有效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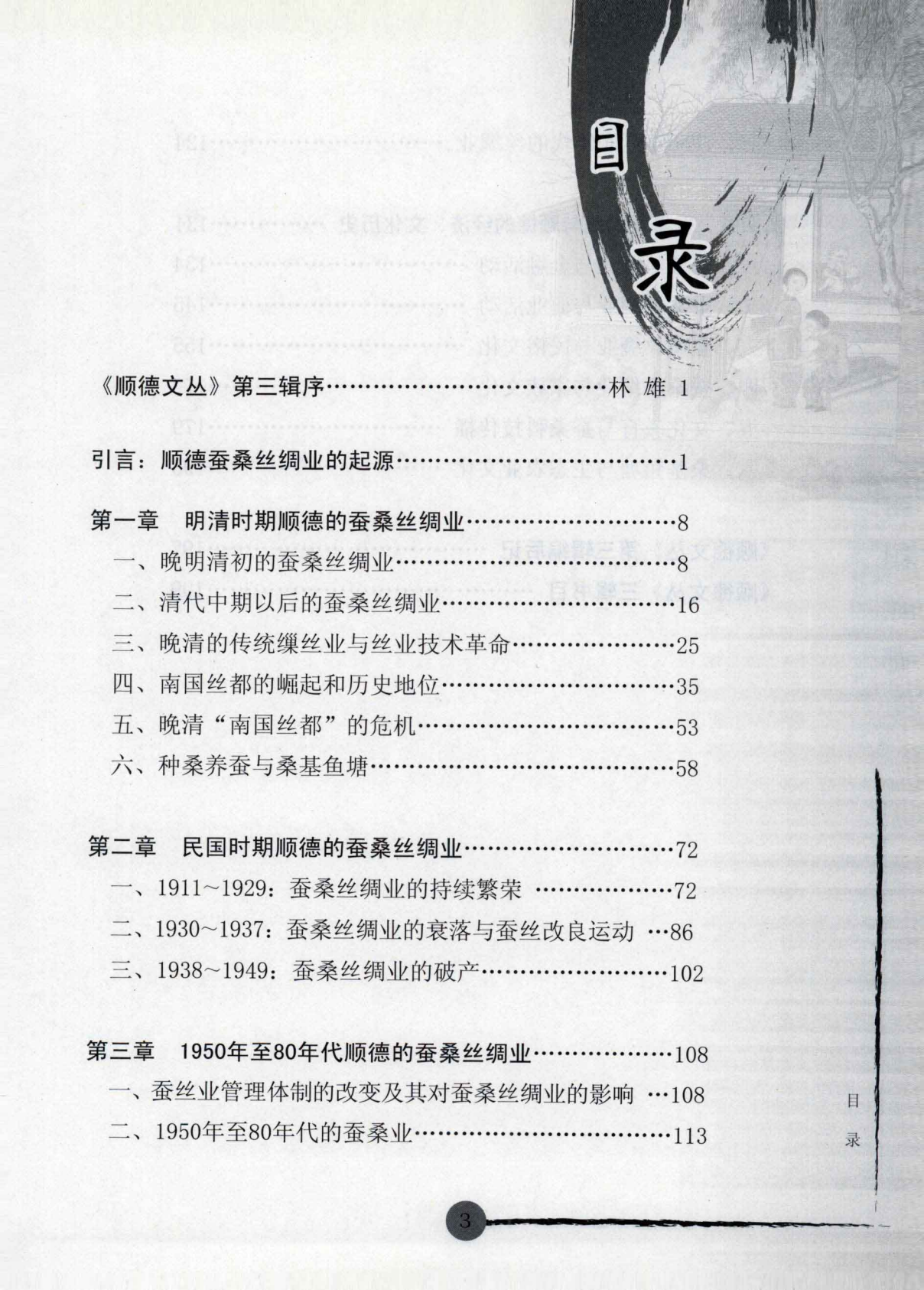
深化综合改革，需要文化的引导。改革源自思想观念之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嬗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既为批判、否定和超越旧的制度和体制提供了锐利武器，同时又以新的价值判断和蓝图描绘开辟了新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作为全省综合改革发展的试点城市，省委省政府对顺德寄予厚望。在综合改革发展的全局中，顺德已充分认识到文化对改革发展的引导作用，先后提出“从拼经济转型到文化转型”，“不仅要担当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更要担当文化发展的领跑者”，充分显示了顺德区委区政府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文化发展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提升思想认识，树立新的改革观，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确立新的改革判断标准，推动综合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以文化创新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的创新，率先建设创新型顺德，进一步增强顺德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努力为广东切实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率先探路，作好表率。

有计划地推出一系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著作，是保护传统文化、彰显文化个性、扩大区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顺德推动文化建设的实干精神和战略眼光。从2005年至今出版的三辑《顺德文丛》，涉及文化多个领域研究成果，勾勒出了顺德区域文化渐渐走向成熟的轨迹。希望《顺德文丛》继续朝着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向不断向前迈进，在梳理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顺德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文化建设领域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为广东县（市、区）域文化建设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参考文本，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顺德建设文化名区作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顺德文丛》第三辑序·····	林 雄 1
引言：顺德蚕桑丝绸业的起源·····	1
第一章 明清时期顺德的蚕桑丝绸业·····	8
一、晚明清初的蚕桑丝绸业·····	8
二、清代中期以后的蚕桑丝绸业·····	16
三、晚清的传统缫丝业与丝业技术革命·····	25
四、南国丝都的崛起和历史地位·····	35
五、晚清“南国丝都”的危机·····	53
六、种桑养蚕与桑基鱼塘·····	58
第二章 民国时期顺德的蚕桑丝绸业·····	72
一、1911~1929：蚕桑丝绸业的持续繁荣 ·····	72
二、1930~1937：蚕桑丝绸业的衰落与蚕丝改良运动 ···	86
三、1938~1949：蚕桑丝绸业的破产·····	102
第三章 1950年至80年代顺德的蚕桑丝绸业·····	108
一、蚕丝业管理体制的改变及其对蚕桑丝绸业的影响 ···	108
二、1950年至80年代的蚕桑业·····	113

三、1950年至80年代的丝绸业124

第四章 蚕桑丝绸业与顺德的经济、文化历史134

一、蚕桑丝绸业与金融活动134

二、蚕桑丝绸业与商业活动145

三、蚕桑丝绸业与民俗文化155

四、蚕桑丝绸业与家族文化172

五、文化教育与蚕桑科技传播179

六、桑基鱼塘与生态农业文化190

《顺德文丛》第三辑编后记197

《顺德文丛》三辑书目199

引言：顺德蚕桑丝绸业的起源

要论述顺德的蚕桑丝绸业的起源，必须要上溯到中国古代蚕业的起源。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国蚕业的起源地。黄河流域比较早的蚕业起源实物，是在山西发现了一个年代距今5600~6080年的蚕茧。在河北正定南阳庄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了两件陶蚕蛹，根据科学鉴定，这是对照实物仿制的家蚕蚕蛹，该遗址同时发现可理丝，既可打经，又可打纬的骨匕。河北正定出土的陶蚕蛹实物和山西的出土蚕茧相互印证，说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育蚕缫丝。在长江流域，浙江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丝织物，有绢片、丝带和丝线。遗物保存在一个竹筐里，同一探坑中出土的还有大量稻谷。经过科学鉴定，钱山漾的丝织物是典型的桑蚕丝结构，说明当时长江流域已有相当高水平的丝织技术。¹

尽管在新石器时代的两大流域中都出现了蚕丝业的起源，而且当时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水平也不会低于黄河流域。但是在后来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两大地区的蚕桑丝织业水平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差距。黄河流域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前，一直是中国的农业经济重心，也是中国的蚕桑丝织业中心。而长江流域，从汉代到唐以前，蚕桑丝织业的水平一直比黄河流域要落后得多。贞观年间，监察御史萧翼替太宗至江南寻找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向人自称北方来的蚕商，将北方的蚕种拿到江南来卖。²这说明北方的蚕种优于江南。同时北方特有的桑树品种鲁桑，传到江南后，因其叶厚

1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2 (宋)李昉《太平广记》5卷《购兰亭序》，中华书局，1961年，第1589页。

多汁而被育成湖桑系统的桑树品种。北方丝织品技术也优于江南，北齐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已经说“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唐代开元、天宝之间，薛兼训在江南为官，以“越人不工机杼”，秘密招募军中还没有结婚的将士，“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¹这说明唐代江南的蚕桑和丝织技术都受到了北方的影响，才有了很大的进步。随着唐代中后期蚕丝业中心的南移，长江流域的蚕丝业才逐步超过北方。江南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蚕业的中心。可以说，后世江南的蚕桑业是在本地蚕业的基础上和北方蚕业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在岭北的蚕丝技术南传以前，珠江流域的蚕丝业也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轨迹。尽管没有更早的出土文物和文献史料来说明这一点，但是基于对华南地区桑树和蚕种的特点的分析，学者们认为广东的蚕桑丝业有其特点，是岭北蚕业所没有的。美国蚕业专家考活在1924年写《南中国蚕丝业调查报告书》时，认为广东热带蚕有多种：黄金色茧，质地柔软，属于热带种多化性，一年可以饲育多次。尚有一种是混多化性。民国时期海南地方所产之茧，极大而极软，浅黄金色，也是纯多化性种，年可饲育九次，雷州的蚕与此同。广东蚕种还有半属于多化性种的轮月种，其茧小，椭圆形，长约一英寸，丝质柔软如海绒，茧之外层和内层贴连，茧色混杂，由白色以致青黄色混合之茧，青茧作六成，白茧作四成，或有全作金黄色者。²多化性蚕在岭北蚕区曾经有过，如隋代、唐代前期，气候暖和，江西的豫章：“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³这是多化性蚕。多化性蚕在寒冷地区是没法生存的，所以后来长江以南天气变冷就不见了多化性蚕的存在了。华南农学院蚕桑系的专家杨

1（唐）李肇 《唐国史补》卷下。

2（美）考活著，黄泽普译，《南中国蚕丝业调查报告书》，1925年，岭南农科大学印，第64页。

3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

宗万教授，也认为华南地区的多化性蚕是独立起源的。民国时期海南的多化性蚕是典型的热带种，清代海南的方志上也有记载野蚕的分布，这说明《汉书·地理志》所载海南黎族先民所养之蚕，是不同于北方地区的多化性种。与一年饲养的多化性蚕种相匹配，华南的热带桑种可以一年四季都能生长，以适应一年四季都能养蚕的需要，这也是北方的桑种所缺乏的生理特性。

后世珠江三角洲蚕种和桑种都呈现比较复杂的现象。考活记载顺德等地饲养的头造和二造，是属于二化性的蚕种，只能在气候稍寒冷的正月和二月能够生长。其余时间饲养的三、四、五、六等造的轮月种，却是半属于多化性种。头造和二造的正造，其二化性特征，肯定是从岭北传来的；而轮月种则可能原本为多化性种，在后来与二化性种杂交的过程中，丧失了完全多化性的特征而成为半多化性或者混多化性种。¹广东的桑种也一样复杂。原产广东的桑树一年四季都能生长。但是后来的桑种既有北方传来的鲁桑，也有江南地区传来的荆桑，移植到岭南之后都能一年四季生长，这一特征也是原来的鲁桑和荆桑原来没有的。这可能是鲁桑和荆桑传到岭南之后，和本地热带桑种杂交后，一年四季都能生长；也有可能鲁桑和荆桑传到岭南之后，经过长时间的人工培育，都具有了对热带气候的适应性，一年四季都能生长了。

汉代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蚕业。很难对汉代的顺德平原上的蚕业作推论。汉代顺德平原上已经有一些冲积地得到开发，如石涌曾经是南越国宰相吕嘉的故乡，顺德的简岸一带，曾经一度作为番禺城的城址，后来因为“沮洳难居”而迁回广州。在已经开发的冲积地上，是否有蚕业还很难说。至于在广州南越王墓葬中出土的丝织品，没有证据说明是广东本地出产的，更有可能是通过贸易途径获得的岭北的丝织品。汉代到六朝、隋时期，广东还是“俚”、“僚”杂处的地区，地广人稀，农

1 (美)考活著，黄泽普译，《南中国蚕丝业调查报告书》，第64页，1925年，岭南农科大学印。

业发展比较落后，即使有蚕业，也只是零星分布，估计丝织物的水平还很差，岭北的蚕业对本地蚕业还没有什么影响，因此限制了本地蚕业和丝织业的发展。

唐代可能是广东的蚕桑丝织业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安史之乱到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度岭之前，广东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人口在南方各省中居中等水平。¹人口的增加主因是北方移民的南迁。来自岭北的蚕业技术开始影响了广东。最早记载广州地区蚕业的有《新唐书》，广州地区有丝布作为贡品，岭南地区作为贡品的还有爱州九真郡纱、紵，雷州海康郡的丝。²此外，唐人张籍《送严大夫之桂州广西桂州》诗云：当地“无时不养蚕。”³唐代广州地区已有丝布作为贡品，估计其质量也较高。《太平御览》记载岭南道“稻得再熟，蚕亦五收”。⁴在日本的正仓院，收藏有被命名为“广东锦”的唐代丝织品。这种织物，是以染花丝经织成，显示了较高的印染和丝织水平。⁵唐代苏鹗《杜阳杂编》卷中记载：唐永贞元年，广州的官府向朝廷进贡年仅十四岁的奇女卢眉娘，她能够在“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外，执幢捧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上叹其工，谓之神助”。卢眉娘可能是在官府开办的织锦机构中从小受到训练的织女，她的丝织物反映了唐代广州地区丝绢刺绣水平，但其丝绢与刺绣的技术应该来自岭北。又十世纪阿拉伯人记载在晚唐时黄巢攻占广州时，屠杀阿拉伯商人，令广州地区的蚕桑业受到摧残。对照《新唐书》卷

1 方志钦主编《广东通史（下册）》，第3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七》。

3 （唐）张籍《送严大夫之桂州》《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四，4318页，中华书局，1960年。

4 《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岭南道》，中华书局，1960年。

5 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309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

一九下《僖宗》的记载：“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盗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十世纪阿拉伯人记载：“敌人砍伐了围绕广州城的桑树种植园。过去人们在那里细心地培植这些桑树，因为这种树的叶子用作产丝的蚕的食物。所以，破坏桑树阻碍了中国丝绸的生产，中断了向穆斯林国家的生产。¹说明广州港当时存在丝绸贸易，其产品有相当部分是广州附近地区所产。

如果仅以上述的记载，还不足以说明唐代顺德平原就有蚕桑丝织业。因为唐代的顺德还多为汪洋大海，只有在那些孤岛上的丘陵地带有人居住和从事农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珠江三角洲的顶部已有不少的唐代聚落，如在中山冲缺三角洲，在顺德县的龙山、龙江都有唐代居民点，²但有否蚕丝业尚难确定。

宋代岭南地广人稀的现象由于人口的增长而得到初步改变。宋初平定广南时，只得170263户。元丰六年广东人口数应增一倍，即为220余万口。³两宋广东人口总的趋势是增加的。珠玑巷民族的传说就反映了在两宋时期人口不断南迁的过程，主要是两次大的人口迁移高峰造成了岭南人口的增加。一次是北宋末、南宋初。比较有确切年代的一次有组织、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南宋绍兴元年，由罗贵等97家33姓向珠江三角洲各县的移居。而这97家的户主，根据族谱可以确考的有18人。另一次是在南宋末年，大致是在景炎元年，在元兵南下的压力下，岭北的湖南、江西等省人民逾岭而南，以及随南宋行朝由闽入粤的大量军兵士民，宋朝宗室等，在南宋行朝灭亡之后散居于广东各地，移居地主要是珠三角这些待开发土地较多的沿海平原。元代时间虽不足百年，但广州地区人口逐步增加。根据大德《南海志》的计算，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广州户数为172284，大德八

1 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181页，转引自李庆新《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108-109页，中华书局，2010年。

2 曾昭璇等，《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9-61页、85页、108页、234页，1987年。

3 方志钦主编《广东通史（上册）》，708页、70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年（1304年）户180873，如平均每户5人计算，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广州人口861420，大德八年（1304年）人口904365。¹人口的增加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开发，南、顺平原的不少冲积地被改造为农田，主要是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得到较大发展，估计当时的蚕桑业也是发展的。

历史地貌研究表明，唐宋珠三角居民有从高地向低地迁移，以开发冲积平原的过程。地理学家曾昭璇论证了唐宋珠三角不同类型的聚落和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方式。他以桑园围内龙江的锦屏山为例，唐代当地建村的聚落在山脚，将南坡的扇形地和坡积面发育地开发为水田，肥力较差。而宋代建村的聚落多在桑园围内的冲积平原，开垦的是冲积地，肥力较高。在番禺石桥台地、东莞城区的唐宋聚落和开垦都有这样的案例。²由于珠江口冲积平原的扩展，以西樵山为中心的南、顺平原的冲积地有所扩

大，人们需要修筑堤围来开发低洼地，于是就有了桑园围的建设。桑园围是位于宋代珠江三角洲最南端的堤围，它的特点是利用西、北江顺流而下的形势，根据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上流之水和下流之水具有落差，将堤围建成向下开口的形式，在围的下游留下两个水口，利于潮水宣泄。围内田亩以西樵山为中心，横跨南、顺平原。宋代建成桑园围之后，为堤内田地的开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明清两代桑园围都在宋堤的基础上发展，一直是珠三角的最大堤围。从桑园围的名称推



妇女摘桑，给桑树剪枝

1 元大德《南海志》卷第六《户口》，广州史志丛书本，第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曾昭璇等《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第222页-22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测，这个珠三角历史最悠久的蚕区，在宋代堤围建设以前就有了蚕业的基础，故宋代建设基围时以桑园命名，其蚕桑业的地区就在从南海九江乡一直到下游的顺德平原的龙山、龙江、甘竹这些历史上主要的传统蚕区。元代广州路土产中有纁、紬、纱等蚕丝产品，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元代珠三角蚕业的发展。

学者们多将宋代珠玑巷的民族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结合起来，认为珠江三角洲的精耕细作农业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定居珠江三角洲的岭北迁民传入的，除了先进的稻作技术以外，还有岭北先进的蚕桑技术。岭北的二化性蚕种传入广东，与当地的多化性蚕杂交；岭北的荆桑、鲁桑与岭南一年四季都能生长的桑种杂交，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后世顺德蚕区具有特色的蚕业技术。

1 大德《南海志》卷第七《物产》，第28页，广州史志丛书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一章 明清时期顺德的蚕桑丝绸业

一、晚明清初顺德的蚕桑丝绸业

蚕桑业和丝织业作为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其发展的前提是人口和耕地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说说从顺德开县到晚明时这一方面的情况。

明代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顺德从南海分治出来，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黄萧养起义的发生，使统治者认识到需要加强对珠江三角洲腹部广大平原的控制。顺德平原水域广阔，居民民风强悍，不服王化者拒纳赋税，或者为“贼”为“盗”，对封建统治是一大威胁。所以，在建县之时，取县名为顺德，就是希望当地的居民以后“顺从德化”。建县后，统治者加强了对居民的教化和统治。建县早期的县令，都以稳定地方的治安，发展农业为要务，如周亶为浙江人，是顺德最早任职的县令，在其任上“严行保甲，复淳淳劝导从逆众安插，还里者不敢复逞。……下乡劝民务本力作。”钱溥，直隶华亭人，晚明时为县令，“尝为耕桑政教图，男妇老稚皆见知劝”。¹“劝民务本”就是劝导人民努力进行农业生产；“耕桑政教图”当为古代“耕织图”²的一种，将耕作、播种、收割和养蚕、种桑、缂丝、纺织的农业生产过程很详细地画出来，然后每一张图都配上诗歌作为解释，这种图诗并茂的方式很容易使人民获得农业生产的知识。所以说，在建县之后到晚明的时期，顺德的以农桑结合、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得到

1 咸丰《顺德县志》卷21《列传·文传》。

2 按“耕织图”是宋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农业文献，每幅图展示耕种、栽培或者养蚕纺织的一个过程，以图配诗，最早的“耕织图”为宋代楼铸所作，后代多有效仿。

了很大的发展。

明代广州府主要县份的耕地都有很大的增加。顺德县虽然也是沙田县，但是距离出海口已远，县内的河道虽还被称为海，但由于冲积地的开发，已经变成小海，所以开县时耕地开发的余地不大。明代天顺六年（1462年）到弘治五年（1492年）顺德的耕地为8475顷，正德七年（1512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为8566顷，隆庆六年为8594顷，万历十年（1582年）由于土地清丈，达到8700顷。¹增长的幅度不大。这些数字也可以说明到晚明时，顺德耕地的开发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

而到了万历20年（1592年）前后，广东已经处于人口增加的最高峰。明代的人口数，也是一笔糊涂账。到晚明时，地方官只对纳税的人口做登记，而不计非纳税人口。这样，方志上的人口数往往不能真实反映实际的人口数。而实际上，顺德建县之后，人口增加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宋代南、顺平原修建堤围以后，人们多将居住点从台地、山冈迁往低地平原。²这为明代老三角洲内人口增加创造了条件。宋代南迁的氏族，在明代人口大增，是顺德等老沙田区内的普遍现象。嘉庆《龙山乡志》卷首《龙山图说》：宋元以前山外多为大海，只是明代加筑堤围，沧海变桑田，烟户始众。以后，农业开发从丘陵高岗迁向地势低矮平坦的平原，因此南海、顺德是明代珠三角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嘉庆《龙山乡志》卷四《户口》记载，明初龙山乡，“户口不过七百余家，男妇共计不过一千八百余口。嘉靖年间编户则已三千余家，阅明季则又七千八百余家”。如果只是按照五口之家计算，明初龙山乡人口为3500人，嘉靖间为15000人，明末为39000人。叶先生认为类似的例子还有南海的九江乡³。明代宗族族产的膨胀从一个侧面说明宗族人口的增加。如顺德《北门豫章罗

1 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七《广州府赋役》。

2 曾昭璇等《宋代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第222页~22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的人口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集》第六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